



文学思潮与 当代小说

陈美兰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

陈美兰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陈美兰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2

ISBN 7-307-00654-5

I. 文…

II. 陈…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小说—创作方法

IV. I206.7 I054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崇阳县印刷厂印刷

1994年1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29千字 印数 1001—3000

ISBN 7-307-00654-5/I·165 定价：8.80元



陈美兰, 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获湖北省屈原文艺创作奖、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二等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合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获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风雨四十年》(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获第三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目 录

上 篇 思潮篇

40—7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及文学思想论争特点的探讨	3
一、认识期待着新的超越	3
二、关于历史系统的把握	5
三、文学思潮演进中的几次碰撞	7
四、“从事后开始”的思索	18
5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探索与争鸣的历史追寻	21
一、创作争鸣——考察文学思潮的重要通道	21
二、争鸣线索寻踪	22
三、争鸣作品的历史价值和作品争鸣的历史意义	26
新时期小说创作思潮辨析	29
一、新时期小说创作发展的特定背景	29
二、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与突进	35
三、“文学寻根”热潮掀起的原因及影响	51
四、现代派小说创作潮流的形成	63
五、关于“新写实”和“先锋派”小说	75
“文学新时期”的意味	87
一、关于文学的多元格局	88

二、关于现实主义的命运	93
三、关于文学价值基准的确立	97

热浪中的沉思

——在中西文化思潮碰撞面前	104
---------------------	-----

下 篇 创 作 篇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发展概略	115
建国后长篇小说两次创作浪潮的探讨	123
人们需要更能拨动心弦的音阶	145
期待着更强的突破力	148
论长篇小说创作的思维定势	156
“殿堂”遐想录	163
寻求生活的“反射和回声”	168
“套钩”·性格·“门道”	173
当他们迈向长篇小说领域的时候	182
悲剧力量从何而来	192
这是一颗多么耀眼的流星	201
让三百年前倒下的英雄再站起	212
一个有生命的艺术实体	223
中国式的“这一个”	227
值得重新审视的“辙印”	231

在崎岖的路上攀登.....	246
她终于把住了艺术创作的“天平”	260

附 录:

史观·史识·史鉴

——谈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	265
---------------------	-----

跋.....	290
--------	-----

上 篇

思 潮 篇

40—7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及 文学思想论争特点的探讨

一、认识期待着新的超越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研究其它时代的文学、其它国别的文学一样，是不能回避对文学思潮的研究的。不正确把握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阐明文学史上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也不可能准确评价当代的作家和作品。因此，对于文学思潮及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学思想论争的探讨，自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当代文学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建国后前 27 年的文学思想论争进行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就是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开始的。经过了近 10 年的时间，我们对前数十年文学思想论争的认识，已经有过一次重要的超越：不仅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而且还超越了文革前 17 年的认识水平，对一些重大的文艺事件或论争，如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关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等等，给予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这是一个很大的超越。这种认识成果已集中反映在 80 年代初陆续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和一批学术论文中。

这种认识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批判左倾思潮的角度，按文艺政策的变化来观察文艺运动的起伏：建国后第一、二次文化

会——批判胡风——“双百”方针的提出——反右、“大跃进”——政策的调整——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提出直至“文化革命”的极端化。用图式来表示，则是一条马鞍形的曲线： ；第二，集中在几次带明显政治色彩的文艺批判的研究，即《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问题，“胡风集团”问题，“反右”斗争问题，文艺领域的“批修”问题等，对此作出尽量客观、且为当事人双方都比较能接受的评价。

无疑，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建国后文艺运动发展的实际，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来分析，就不得不承认，这种认识框架仍然是陈旧的，它基本上是按照1965年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提出的所谓“五大战役”的模式作为概括的基础，所以很难完全摆脱“左”的视角痕迹，只不过在观点上“翻了个儿”罢了。按照这种认识框架来观察文学发展问题，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只停留在文学发展表象的描述和外部规律的分析，忽视了文学内部规律的探寻，像文学观念的变化、理论主张的特点、观念的产生与一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那几次重大斗争之间很难找出它们的内在贯串线，一种并非人为而是在其内涵上真正沟通的贯串线。其次，文学思想斗争的起落与创作发展的轨迹明显脱节，致使许多创作现象阐释不清，如“反右”斗争后，照理文艺形势正处于低潮，可这时创作实践上却出现了长篇小说和电影创作高潮；又如1955年对所谓“胡风集团”开展斗争后，“写真实”问题受严厉批判，但第二年，创作上却突然冒出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创作又出现个小高潮。如果按照原来的认识框架和演进轨迹来阐述，对此是很难得以自圆其说的。

这些缺陷，说明原来认识的角度、表述的模式已经妨碍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文学思潮的特点，妨碍我们阐明复杂的文学现象，妨碍正确总结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及应该吸取的

真正教训。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建国后至 70 年代中文学思潮的演变、文学思想论争特点的认识需要作第二次超越。

二、关于历史系统的把握

要真正认清建国后前 27 年主宰文坛的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思想论争的实质，我认为首先要对它所处的历史系统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实际上也就是要把握其发展的源头及其走向。这样，就自然要涉及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分期问题。

对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分期，早已流行了近代、现代、当代的提法，其理论前提，即以革命发展阶段来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对应之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学、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学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文学。这种划分，并非完全不合理，但确实明显存在忽视文学发展内在因素的问题，限制了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全面认识。就以近半个世纪的文学来说，笼统地将 1949 年作为一个分水岭或闸门来划分文学阶段是不够科学的，这是直接用社会政治史来类比，而忽略了对文学自身变化特点的考虑。事实上，一种文学观念、文学主张的出现及发展，一种创作潮流的形成及演变，当然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它还会受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受上层建筑的其它因素、以及传统的与外来的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熟知的理论。因此，我们不妨越过社会政治史的规限，让窥探的目光直接投向文学发展的自身。

中国文学发展到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在解放区崛起了一股文学新潮，它呈现着一种明显的新质：其文学主题是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其感情特征是充满翻身自豪感、主人翁感，充满从黑暗见到光明的幸福感、喜悦感；其艺术追求是适应工农兵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形式上推崇民间艺术、通俗文艺、民族传统

形式。这股新潮我们不妨冠之以工农兵文学思潮。这股潮流 40 年代前后在解放区已经萌发，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获得了完整的理论表述，从而显示了一种崛起的声势。但我们应该看到，在 40 年代还不是这股潮流发展的蓬勃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它才获得广泛的发展并真正主宰了中国文坛。

历史实践为这种认识提供以下根据：第一，新中国的成立，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充分的社会政治条件。这股思潮及其理论主张的提出，与文学史上许多思潮的出现不一样，它不是单纯地由文学家提出的，而是通过政党领袖的名义来提出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这股思潮的发展与政治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建国后，政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领袖成为全国人民法定的领袖，这种地位的变化，自然也就为其文学理论主张的推广贯彻，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政治条件。第二，作为这种文学表现的生活主体工农兵，已不仅在概念上是历史的主人，而且在实践中已确实成了国家主人，因而对文学的表现要求就更强烈了。这种强烈的文学主人翁意识，对促进这股思潮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三，建国后，特别是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文化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为这股思潮的繁衍继续提供了适宜的生活土壤。当时，我国广大农村仍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生产力相当低下，整个文化水平确实还面临着普及第一的任务，虽然新制度建立了，但其经济文化特征与当年解放区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从精神生态环境来说，可以说是与解放区“接壤”的，所以，文学上也自然会接受这种“接壤”的要求。

这些都说明，建国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都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说，从 4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这近 40 年的时间正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的一个完整阶段，从崛起至蓬勃兴旺至面临新的矛盾而最后出现新的更迭。我们应该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来把握，才有可能真正理解

近数十年文学思潮演变的特点及文学思想论争的基本历史内涵。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①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这三四十年的道路，有可能从新的历史水平面出发，沿着同“实际相反的道路”去追寻、把握那个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

三、文学思潮演进中的几次碰撞

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中国文学历史行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也不容忽略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段不寻常的历程中，确实充满着各种撞击力量，这是早为人们所承认的事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认识和鉴别这些撞击力量及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过去，我们常习惯于以某种固定的理论模式来规范许多复杂的斗争形态，总把新观念、新主张出现后所遇到的碰撞或牵制，不加分析地就归结为旧有力量的障碍，这种藐视对实践内容认真考察而膜拜于现成结论的恶习，曾经给几十年来的文艺战线造成极大的混乱，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到了跳出这种框囿的时候了。

应该看到，在经过了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思想与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多次论战以后，到40年代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起，它已经是作为中国革命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理论总结而出现的，但是，这个总结本身确实还带有许多不完整性。存在这种不完整性或缺陷的原因，我以为主要在于，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一种文学规律的总结，它应该是许多不同“规定”的抽象。某一民族文学、某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时代或某一地域的文学、某一文学运动、创作潮流或某一作家、作品都是一种“规定”。在进行理论抽象时，其对象——即“规定”的时间跨度越长，空间跨度越广，形态越多样，材料越丰富，那么，从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点”就越合理。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无疑是在“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新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也确实给正在向现代转化的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意识、新的观念。但从更宽宏的历史视野来看，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它所面对的文学情势毕竟有着相对的局限。在中国文学发展形态的考察上，更多注重于主流及与其对抗的逆流，而忽略了支流的作用；在文学发展的空间视野上，更多着眼于解放区而未充分考虑国统区；在文学历史进程的预示上，更多侧重于民主革命的具体进程而未可能远眺社会主义的新趋向。这些，不能不使它在文学的任务、作用、适应层次上的提法带有一定的偏狭性。还有，关于创作过程的考察，也多注意一般性而未足够地重视其特殊性，注意文学的外部关系而未深入涉及到文学的内在机制，等等。这种种局限，正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在理论概括上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性或不合理性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还要看到，在这种理论主张的贯彻和付诸实践过程中，又往往掺进了许多非原理论本身的、外加的阐释，而且这些阐释又总是极力把原理论本身的某些不合理部分更加推向极端，当这些东西都汇进这个理论体系时，更使它变成了一个异常庞杂的理论体，冲淡了它原有的清晰度和准确度，这种无法摆脱的偏狭和庞杂，也自然会诱发一些相异的观念、见解以及一些企图修正或丰富补充它的理论要求。由此，文学思想和理论主张上的相互碰撞以至激烈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这样的思想碰撞，几乎贯串到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演变整个历史阶段中，而其中规模较大、涉及理论面广、影响深远的，我认为应该说有三次，这就是发生在40年代中至50年代前期的与

胡风文学思想的碰撞，发生在 50 年代中期的与秦兆阳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碰撞以及发生在 60 年代初期的与邵荃麟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碰撞。

（一）与胡风文学思想的碰撞

胡风，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二三十年代以来曾为我国革命文学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著述。过去由于某些不负责任的宣传，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胡风是从根本上反对，甚至有意与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相对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胡风对延安整风曾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称它为“含有伟大的革命意义的思想再出发运动”，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其产生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文学发展道路，胡风也明确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从人民解放要求诞生出来的、发展了的现实主义，这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面的战斗的实践道路”^①。由此看出，胡风的基本立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应该说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下，胡风对已经崛起并正在发展的工农兵文学理论主张，确实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或补充了一些意见，这里，大致可归纳为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作家的世界观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提到一个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地位。胡风对世界观问题也是重视的，认为“正是由于作者的人生观或世界观的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情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②但在几个问题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第 1 版，第 288—289 页。

^② 同上书，中册，第 53 页。

上认识是有差异的。

首先是对文艺队伍的估价。胡风不同意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以至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他也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有“游离性”的弱点，所以应该“和人民深刻地结合”。但胡风更着重于指出他们所具有的革命性、先进性一面。由于社会的激变，中国知识分子许多是从贫困处境里苦斗出来的，有些又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劳力出卖者，这种生活颠簸使他们与劳动人民原就有过或仍有着某种联系；而另一部分在反叛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许多也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社会斗争中教育出来的，与先进人民原就有各种状态的结合。这些理由，说明知识分子本身也是人民；而且，在革命思想传播上，知识分子是“思想主力”^①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所以，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部分。

其次是关于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途径，胡风对当时流行的“投身火热斗争”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不认为仅指解放区才是“火热战场”，而是认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②。所以，即使是“这灰色的战场（指国统区——笔者）也是能够有一种火热的内容的”^③。而且，他认为对那些和人民有着联系的作家来说，他们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进行的创作实践，也可以反作用于作家的世界观，促进作家克服世界观中的缺陷。对于作家世界观的改造，胡风也不同意那种“一次完成”论，他指出，历史现实不断发展，所以作家世界观的改造“并不是只虑一次的‘取得资格’的结果所能够保证的”。总之，胡风在作家世界观改

①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21—322页。

② 胡风：《为了明天》。

③ 《胡风评论集》下册，第325页。